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全面内战（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景选平



全面内战(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全面内战, 下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47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66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525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 (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全面内战（下）

主 编	陈文书	吴琼芳			
副主编	王俊林	刘先庆	朱向农	李德定	易亮如
	徐英焰	高蓉生	黄小宁	韩新华	蒲元华
编 辑	丁蜀滇	马宣伟	田乃立	杨 文	李森祥
	周 雷	宓 挺	高士振	林正康	赵月华

目 录

全面内战(下)

一九四九年春至一九五〇年夏

· 华东方面 ·

对《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一文的补正	王楚英(1)
国民党军第六、第八兵团在福建的覆灭	张铁石(12)
记福州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经过	李以劭(20)
我所经历的漳(州)厦(门)战役	孟恒昌(30)
第三一八师起义的曲折过程	赖惕安(34)
第九十六军部分官兵获得新生的经过	黄振涛(43)
闽西起义纪实	傅柏翠(49)
策划、组织闽西起义的经过	李汉冲 练惕生(60)
保护油库 投向人民	金星(69)
解放舟山群岛之战	毛德传(73)
国民党在浙江的溃逃	侯定远(81)
国民党军舟山撤退前后	刘措宜(95)

· 华北方面 ·

绥远起义与部队的胜利改造	袁庆荣 由竹生(99)
我接解放军代表进绥远城	史国玺(106)
第九兵团起义前后和国民党特务斗争纪实	白 震(109)
我所知道的绥远起义	贾 璜(120)
回忆跟随孙兰峰先生参加“九一九”绥远起义	李树诚(128)
第三二〇师起义前后	行定远(136)
国民党军第二二八师在绥远起义经过	杨仲璞 贾海峰(145)
忆新乡和平解放	吴建昌(147)

· 面北方面 ·

第五十七军麟游山覆灭记	徐孔嘉(149)
青宁两马联合扑陕与败退	马全良等(151)
“青马”与“宁马”由联合反共到分道扬镳	李少由(153)
马继援部陇东、关中作战概述	韩有禄 马尚武(155)

马步芳部骑兵第十四旅固关被歼记	马尚武(174)
兰州战役中马步芳部溃败前后的片断	李长福(178)
兰州溃败后的桥头会议	李少白(181)
回忆兰州战役二三事	冶建林(184)
兰州战役始末简述	史载忠等(186)
解放前夕国民党兰州部队的补给情况	孟企三(191)
青马崩溃和酒泉地区和平解放的前后	贺新民(198)
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在新疆解放前夕出走国外的经过	马得勋(208)
马呈祥离新疆出国前的活动片断	李兴标(212)
马继援出走前后	马德福(215)
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入川经过	施有仁(218)
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在秦岭左侧的防御和撤退川西	陈 华(226)

· 华中、中南方面 ·

我从破坏张轸起义到率部起义的经过	赵子立(229)
跟随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回忆	姚奠基(260)
荆门战役琐忆	邹 飞(269)
第七十九军在江陵附近作战的经过	徐光宇(272)
回忆解放战争中的宜都战役经过	徐光宇(277)
宋希濂集团在川湘鄂地区的扩军和覆灭	陈康黎(283)
孙震就任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邹国贤(300)
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始末	雷云仙(303)
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广州撤退前的概述	罗翼群(317)
薛岳在广东的统治及其失败的经过	刘耀寰(327)
第六十三军之续成与覆灭	陈燕茂(337)
第九十一师鹤山起义记	龙 骧(341)
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四师的成立及其役戡	朱始营(344)
第三十九军瓦解前后我的活动情况	牟龙光(350)
国民党在海南岛统治及其覆灭概况	邢森洲(358)
一鳞半爪话海南	何开祥(365)

· 西南方面 ·

蒋介石在云南的军事部署及其最后的失败	卓 立(368)
张群妄图争取卢汉建立西南“反共”基地的阴谋活动	杨适生(378)
国民党在西南的顽抗部署及西南的解放	刘宗宽(388)
解放重庆琐记	李钦哲(396)
记重庆应变及彭斌的率部起义	徐建超(403)
我去迎接了解放军入城	徐至诚(408)

回忆宋一痕与云南起义	席淑英(411)
我奉派联系川康与滇同时举义的经过	卓 立(420)
解放前夕蒋介石解决卢汉的阴谋	胡 翔(426)
云南起义前夕我接受绥署的两个任务	马崇兴(428)
回忆卢汉先生	严中英(430)
云南起义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徐振芳(441)
起义前后回忆	文 鲤(461)
云南起义的经过	严中英(467)
云南起义见闻	丁光仁(476)
回忆云南起义的见闻	廖 谋(480)
云南起义前后的见闻	刘文潮(491)
云南起义前后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回顾	代时中(501)
昆明解放前后国民党高级军官逃亡隐藏等情形	王学臣(505)
第二十六军在滇南覆灭见闻	刘国举(507)
刘文辉起义前在雅安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	张怀猷(513)
参与策动彭县起义始末	潘大遼(516)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彭县西康起义	万 里(522)
潘文华走向起义的曲折道路	郭造勋(525)
第二十四军起义经过	杨家楨(534)
回忆刘文辉部第一三六师起义前后	叶大璋(539)
第二十四军毛国懋团在名山阻击胡部南逃	叶扬和(548)
雅安起义前后	王德全(550)
康定起义和解放目击记	曾文甫(560)
伍培英反蒋倒王与西昌起义	左东枢(571)
我所知道的川康军政各界人士起义活动内幕	胡恭先(579)
我参加策动刘、邓、潘彭县起义片断	胡克林(587)
邓锡侯与刘文辉在彭县起义经过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593)
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在贵州起义经过	王伯勳 王景渊(606)
我率领贵州保安第七团起义经过	赵文华(618)
走向新生	郭汝瑰(623)
我在第七十二军起义	徐孔嘉(635)
第七十二军的覆灭和起义	卿云灿(640)
第七十二军的起义	赵德树(652)
第三十四师起义经过	尚宗钊(654)
范绍增一行起义经过	庞佑珪(659)
第九十五军起义纪实	王大中(683)
我在黔桂边区起义回忆	万式炯(692)
第十六兵团的重建	蔡 钰(702)

第十六兵团起义经过纪实	林肇戎	熊顺义(715)
我所知道的第四十七军	杭阿坦	(742)
第四十一军起义后的整训整编	王大中	(747)
第四十一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什邡起义	吴士彰	(756)
第一二五师川西起义前后	吴章燕	(760)
第七十九军起义始末记	胡祥麟	(763)
第七十九军从反共到起义的经过	龚传文	(767)
从重庆溃退到什邡起义	陈章文	(774)
新三军起义前后	刘荡平	何宏钧(777)
茂县地区的解放	刘识非	(781)
起义前后的回忆	向敏思	(786)
我在独立第三六六师起义前后	皮学义	(789)
西南解放前夕的形形色色	赵秀昆	(791)
第二十兵团起义经过	郭云贵	(800)
忆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一六四师起义片断	郝天羽	(805)
从内战到兴师举义	解云祥	(809)
第二军、第十五军和第一一八军起义内幕	胡禾青	(829)
记第一一八军的起义	方 曦	(834)
第五十四师组成及起义经过	董 惠	(839)
成都起义经过回忆	谭述初	(844)
历尽艰辛 举兵投诚	袁桓楚	(848)
川西起义见闻	贺觉非	(866)
我的一点回忆	裴昌会	(873)
忆参加第七兵团起义前后	王恕之	(876)
回忆我投向人民的经过	朱鼎卿	(879)
起义前后几点回忆	李 振	(884)
第二十军起义的前前后后	景星北	(892)
杨汉烈部起义记	李介立	(901)
成都起义实录	萧 健	(904)
关于《成都起义实录》的补充	萧伯麟	(917)
第五十七军投诚记	刘钊铭	(920)
新十二军起义前后	程志煌	(923)
对郭勋祺迎接解放的片断回忆	罗显功	(928)
成都地区解放前夕的策反活动	熊倬云	(932)
蒋介石采取的“联勤”部署	陈绍岳	(936)
成都的解放和我的起义	曾庆集	(940)
对联勤总部的点滴回忆	程藩斌	(948)
联勤总部第十八临教院起义始末	钟佑杰	(960)

我率部在成都起义	杨 冰(964)
回忆川西起义前后	严啸虎(971)
我参加成都警备司令部的起义	吕允中(977)
回忆我们在成都起义并担任城防的经过	王樵生 徐震球(980)
成都宪兵司令部起义回顾	许锡震(992)
宋希濂直属骑兵团在川起义	刘慨真(995)
西安绥靖公署电信监察科起义前后	张诚信(997)
保安第十一团起义经过	王铭枢(1001)
陆军军官学校解放经过	姚国俊(1005)
陆军军官学校及所属勤务团起义	沈震川(1010)
我当成都最后一个市长的回忆	冷寅东(1014)
保卫成华大学纪实	萧天才(1020)
有关成都解放的点滴回忆	黄孝宜(1025)
起义军官在西南军大高研班受教育	许耀钧(1028)
披肝沥胆指迷津——忆军代表	吴靖宇(1035)

· 其他方面 ·

两航起义亲历记	李开毅(1039)
蒋介石与龙云的斗争	方 耀(1047)

· 华东方面 ·

对《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一文的补正

王 楚 英*

杨伯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少将军长）审稿意见：所述均系较为真切的史料，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

最近阅读《文史资料选辑》，在第三十二辑里看到了李以助同志撰写的《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一文。展读之下，发现文中所述事件，有几处同当时的事实略有出入，现就我的亲历亲知概述如下，俾作补正。

一、有关蒋介石在 1949 年 4 月下旬到 5 月下旬之间的行踪问题

李以助同志在《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以下简称《李文》）第九段写道：“4 月底，蒋介石由溪口潜至上海，在龙华机场向汤恩伯、陈大庆（上海警备司令）、石觉（上海防守司令）、毛瀛初（上海区空军司令）指示机宜之后，即飞台北转马公岛（澎湖列岛的主岛）。”第十段写道：“蒋介石率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上海作战开始后 5 日，即由马公岛乘兵舰来吴淞口督战。”第十一段又说：“5 月间，参谋总长顾祝同携带整编福建部队方案，乘专机至台湾和陈诚磋商之后，又飞往马公岛请示蒋介石……”

但是，我的同学王玄飞、杨风藻和蒋介石的内卫队长张京云等人所说的关于蒋在这段时间内（王等人于 1949 年 4 月 29 日，随侍蒋介石由台湾飞抵上海后，我曾与他们在复兴岛上晤谈）的行踪，与《李文》之所述多有不同。王、杨二人当时是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张京云与蒋更是寸步不离，他们三人都同我有深交，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情况，是比较确凿的。

据王玄飞、杨风藻、张京云告知，蒋介石于 4 月 22 日在杭州会晤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之后，即在蒋经国、俞济时、曹圣芬等人陪同下径飞台北，先住草山（时已改名为“阳明山”），后移高雄，住在寿山上（在高雄要塞内），并没有住过马公岛。

* 作者时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九六师参谋长、第五十二军代参谋长。

蒋在溪口的全部随侍人员则已先期撤到台北草山。29日，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曹圣芬等护卫下，由台北乘飞机到达上海，并在复兴岛住下。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上海的有袁守谦、贺衷寒、吴国桢、张道藩、雷震、谷正纲、周至柔、桂永清、郭忏、邓文仪等等。袁守谦、邓文仪、贺衷寒等人衔蒋介石之命于5月1日在上海召集军校同学400余人开会，成立“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护党救国非常委员会”，发表了《告同学书》和《关于时局的声明》，重弹蒋介石“奉行三民主义，坚决反共到底”的老调，打起拥护“总裁”、“校长”及实行“护党救国”的旗帜，鼓吹要“同共产党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蒋介石于4月29日飞抵上海后，当天下午即在上海北四川路汤恩伯总部，召集在上海的三军部队团以上军官训话，带头为在长江防守作战中阵亡的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第五十四军第二九一师师长廖定藩默哀，同时痛斥林遵、戴戡光和骆周能及在江防作战中“投共”的其他将领“叛背党国，罪不容诛”。当场宣布，国防部对于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应予明令通缉，拿获归案者即格杀毋赦；对于那些作战不力、丧师辱命的人定要军法从事，不得宽纵。

5月1日，由袁守谦、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筹组的“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护党救国非常委员会”，在北四川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正式成立。蒋介石虽然没有亲临其会，但向大会颁发了《校长训词》，由袁守谦代为宣读。

4日，阎锡山由广州到上海见蒋介石，商量关于敦请李宗仁到广州主政的问题（因李宗仁于4月23日飞离杭州后，径回桂林去了，广州国民党政府已是群龙无首，故促李回）。5日，驻淞沪地区国民党陆海空军部队的团以上干部约300余人，被召集到复兴岛听取蒋介石的训话。上午8时，蒋介石身穿便服，在周至柔、桂永清、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曹圣芬等人的簇拥下走进会场，全体与会者在石觉的指挥下，肃立致敬；蒋介石走向讲台时频频向大家点首示答，口中还连声地说：“好！好！”待他走到讲台后面站定、举目环顾后，石觉才发令让大家坐下。这天蒋介石的讲话历时两个多小时，通篇充满愤懑与怨恨，且神情多变，时而勃然大怒，声惊四座；时面黯然神伤，如泣如诉，不禁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失败者发出的绝望哀鸣。蒋介石曾讲到：徐蚌会战失利之后，他曾决心纠集残余部队，固守南京，背城借一。他说：“南京乃国父创建民国的定都之地，且系国父的陵寝所在，为海内外瞻望之所系，我去此一步，即无死所，自当与城共存亡，岂能弃此民国首善之区任其沦落遭劫。怎奈党内一伙权欲薰心之徒，只图一派之私利，全然不顾国家危亡，竟然趁时局之逆转，剥夺了我以身殉国之机会，甚至公然逼我出国，其丧心病狂，曷此其极！”说到这里，蒋介石已经声哽欲泣了，引得我们这些听者也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蒋介石承认这是他领导国民党二十多年来所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是他最痛心疾首的败绩。他认为招致这样崩溃性的全面失败，不是因为三民主义过时了，恰恰是因为三民主义没有得到实行。他承认在国民党内有些人口中讲三民主义，实际上却不实行三民主义，甚至做出了违背三民主义的蠢事，以败“授共产党以向我进攻之机”。蒋介石振振有词，想唤起我们对三民主义的信念，同时也想借此激起我们对他的感情和信心，这实际上是徒劳的。当时我们“听训”的人表面上虽然都正襟危坐，凝神谛听，内心里却各有各的打算，真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貌”。蒋介石讲到国民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用人不察，姑息养奸，他培育出来的黄埔学生和将领中有一部分人完全背叛了“国父遗教”、“党员守则”、“军人读训”和他的教诲，“寡廉鲜耻”，“甘心附敌”。他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只要我们清除掉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共党间谍和同情共党的分子，整肃军纪，重振军人魂，我深信哀兵必胜，奇耻可雪。”蒋介石接着列举了一些“必能转败为胜的有利条件”，鼓励我们要树立必胜的信念，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精诚团结，戮力同心，明耻教战，发愤图强。他还提出要以郭子仪、曾国藩为榜样，作中流砥柱，创中兴伟业。并告诫我们要谨防共产党的挑拨离间和收买利用。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掉各人的“心中之贼”，真正地在各自的心田里树立起“军人魂”的碑石。蒋介石也讲到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缺乏信心、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事实。他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在目前的态势下（一是杜鲁门、艾奇逊在美国主政，二是国民党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不可能恢复对国民党的援助，要求我们依靠自身的力量，“打好上海这一仗”，“必须在上海坚守半年以上，并应尽可能消灭共军一二十万人，同时牵制共军二三十万人，以便掩护二线兵团的组建”。他认为，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远东地区不久可能会爆发新的战争（这是蒋在分析了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形势后作出的判断）。他多方鼓励并命令我们一定达成固守上海的任务。他说：“只要在上海能打赢，坚守半年以上，一旦远东局势突变，杜鲁门就必然会主动地找上门来，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上海这个桥头堡，再打出去，那就方便多了。”他的结论是：“坚守上海，待时而起；自力更生，扭转局势。”

6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分别召见第五十二军的军长、副军长、军参谋长和各师的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并作个别谈话。我也受到召见。此外，第五十四军、七十五军、三十七军、九十九军、十二军的师长以上干部分别在10日之前受到召见，第二十一军、五十一军、一二三军的军长也相继受到召见。

11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集军以上干部会议，就上海作战作了部署。下午，汤恩伯在其总部召集师以上干部，进一步部署上海作战准备，并颁布了《战时军律令》，宣布“十杀不赦”。

13日凌晨，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询问月浦、杨行方面的战况，并对第二九六师连日来在浏河附近作战的战绩，表示嘉奖。

13日下午4时，蒋介石派蒋经国、谷正纲、张道藩、雷震、邓文仪等人（由石觉和刘玉章、蒋纬国、邵百昌、柳际明等人陪同）赴月浦前沿阵地视察，代蒋介石向第二九六师官兵表示慰问并口头嘉奖。

14日下午3时，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以下的“战功卓著”的官兵数十人，亲向刘玉章、刘梓皋、郭永、杨敬斌、李盛、何志浩、孟宪廷、马荣相、万育才、马文涛、陈玉成等颁发了勋章（我也获颁勋章，但因奉命在月浦师指挥所代理师长刘梓皋的职务，指挥部队抢修工事，整顿部署，积极备战，故未参加此次召见）。

是日傍晚，解放军集中了约5个师的兵力对月浦、狮子林一带第二九六师的阵地和杨行地区第二师阵地，发动了异常猛烈的进攻。从当晚10时到15日上午6时，蒋介石

曾亲自同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通过四次电话，询问战斗进行情况并指挥战斗。15日凌晨，月浦、狮子林一带恶战又起之时，蒋经国给第二九六师师长刘梓皋打电话，了解情况，因刘梓皋不在，由我代接。蒋经国在电话里向我传达蒋介石的命令，严令第二九六师必须尽一切手段击退解放军的进攻，确保现阵地，“有功者重赏，失职者严惩不贷”。

17日夜间，在第二九六师和第二师分别在月浦、狮子林和杨行、刘行地区第三次打退了解放军的进攻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于18日上午来到月浦第二九六师视察，再次向官兵们宣达了蒋介石的嘉奖。直到23日中午，蒋介石仍然在上海复兴岛坐镇指挥。

23日，根据蒋介石的决定，浦东兵团司令官阙汉骞纠集第七十五军和九十九军共约15个团的兵力，对金桥、张桥等地进行反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夺回了第三十七军于22日晚失去的阵地，战后即被汤恩伯、邓文仪吹嘘为“浦东大捷”，大事鼓吹。但当时沪西兵团已被击溃，解放军已打到了苏州河并占领了大部分市区，形势迅速逆转，蒋介石遂命令汤恩伯将浦东部队撤回，着手组织部队从海上撤退。他自己则在桂永清、蒋经国、俞济时、曹圣芬、谷正纲、邓文仪一伙的护卫下，登上“太康号”兵舰，于23日中午稍过驶向吴淞口，然后驰往定海，改乘飞机去台湾。抵台后先住在台北阳明山，旋移住高雄寿山，到6月中旬才返台北，仍住在阳明山，并亲自主持了在台北市介寿馆（原日本台湾总督府）召开的“东南区军政会议”。

二、关于召开“东南区军政会议”和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问题

《李文》说：“自蒋介石在6月下旬开会回台之后，因福建的朱绍良、汤恩伯，广东的余汉谋、薛岳，浙江的周鼎、丁治磐，均先后表示拥护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来统筹兼顾以资确保东南，于是在6月25日蒋介石即发表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以王东原、罗卓英副之。6月27日至6月底，东南军政会议于台北召开，规定苏、浙、闽、粤、台五省主席，闽粤绥靖主任，各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各绥署参谋长，驻台各军师长出席参加……7月1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开始行使职权……”

《李文》所说的东南区军政会议召开的时间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的时间，同事实有出入。现就我参加东南区军政会议时的见闻，分述如后：

1949年5月底，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城市和广大地区已全部解放，解放军的前锋直薄福建、广东、湖南；陶峙岳在新疆，董其武在绥远，程潜、陈明仁在长沙，正在酝酿局部地区和平，举行起义；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危如累卵，破在旦夕。作为“和谈内阁”的阁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遂提出辞职。这时，代总统李宗仁经居正、阎锡山等人亲赴桂林劝驾，虽然已回到广州坐镇，主持国民党的“中枢大政”，但实际上的指挥权却仍操在身居台北的蒋介石的手中，除了邱昌渭、甘介侯、程思远、黄旭初、白崇禧之外，李宗仁的命令仍然没有人听。因此，关于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曾使李宗仁很伤脑筋，经派出吴忠信、吴铁城、洪兰友等往返于广州、台北之间，向蒋介石征求意见后，最后才确定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经立

法院会议表决通过。阎锡山于6月初在广州组成班底，开张视事后，即带着他的《拯救危局的作战方案》连同他在山西推行的《兵农合一》政纲，在顾祝同、肖毅肃、刘杰（山西籍的立法委员、阎的智囊之一）等人的陪同下，飞到台北向蒋介石汇报，曾同蒋竟日长谈。阎锡山在台北还召集陈诚、朱绍良、汤恩伯、周焄、丁治磐、胡璉、石觉、孙立人、李良荣、彭孟緝、罗卓英、王东原、肖毅肃、万耀煌、桂永清、周至柔、郭忏、袁守谦、吴国桢等和台籍人士黄朝琴、李万居、蒋渭川、陈东闵等人分别开会，研究统一东南区军政指挥机构问题，决定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揽并协调江、浙、台、闽、粤五省的军政事宜。当时内定陈诚任长官，罗卓英、王东原任副长官，肖毅肃任参谋长，车藩如任秘书长，由吴国桢继陈诚任台湾省主席；撤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设立台湾保安司令部，由彭孟緝任司令；设立台湾防卫司令部，由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兼任司令；撤销京淞杭警备总司令部，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指挥所，由汤恩伯以副长官名义兼主任；撤销淞沪防守司令部，设立舟山防卫司令部，由石觉任司令官。另决定在6月10日左右，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政会议（以行政院和国防部的名义召开），指定陈诚、顾祝同主持之。上述这些决定和人事上的内定，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不过假阎锡山之口讲出来而已。据说阎锡山和蒋介石还研究了一方面努力经营东南，巩固台湾，以台湾为基地反共到底；另一方面整顿华中、西南、西北，力求迟滞解放军的进攻，争取有利时机，进行反攻的问题。他们并讨论了整顿国民党和在台北设立训练中心（后来设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及整编东南地区国民党武装力量等问题。

6月12日，东南区军政会议在台北市介寿馆二楼正式开幕，一直开到20日才结束。蒋介石曾两度亲临训话，会议由陈诚和顾祝同分别主持（实由陈诚总揽全权）。参加会议的有：罗卓英、王东原、汤恩伯、朱绍良、肖毅肃、车藩如、李良荣、刘汝明、李延年、石觉、周焄、丁治磐、吴国桢、万耀煌、彭孟緝、孙立人、胡璉、何世礼、周至柔、桂永清、郭忏、彭位仁、彭善等；还有高雄要塞司令吕国桢，基隆要塞司令刘翼峰，马公要塞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装甲兵司令徐庭瑤、副司令蒋纬国，陆训部副司令贾幼慧、舒适存、参谋长林木森，第六军军长戴朴、第二〇七师师长王启瑞、第三三九师师长张国英，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副军长彭战存、第二〇一师师长郑果、第二〇六师师长邱希贺，军校第四军训班副主任辛钟珂等。另有马纪壮、刘广凯、宋长志、黎玉玺、周雨寰、杨厚采、王叔铭、徐焕缙、胡伟克、邵百昌、柳际明、郭履洲等。原在上海作战时已撤到台湾的第十二军、二十一军、三十七军、九十九军的残部及较完整的第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和第二〇四师、二〇八师各部队师长以上干部均参加了会议。我以第五十二军代参谋长名义也参加了会议。驻守舟山的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和暂一军军长董继陶、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沅等也到台北出席了会议，广州绥靖公署和广东省政府、海南岛行政长官分署均派有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与会者共计百余人。

12日上午8时前，参加会议的人员凭出席证进入介寿馆二楼会议厅；随员则凭随员证进入，被安置在指定的房内休息。8时整，蒋介石在陈诚、顾祝同、蒋经国和曹圣芬陪同下步入会场，与会人员罗卓英的指挥下，肃立致敬。顾祝同以参谋总长身份宣布开会后，即由蒋介石讲话，他仍然是怀着忧伤而沉痛的心情，用激昂而愤慨的语调，

剖析大陆作战失败的原因。他说，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些国民党员和黄埔学生对他阳奉阴违，不听指挥，见利忘义，贪生怕死，甚至出卖灵魂，叛变投敌。还有些人专谋个人和派系的私利，拥兵自重，不是临阵退缩，便是见危不救；不是争地盘，争权势，便是互相排挤，互相拆台，宁肯利敌，不肯利友。蒋介石对于那些起义的人，则切齿痛斥，要求国防部悬赏缉拿；对于那些临阵退缩、一溃千里和玩忽职守、丧师失地的人，要求国防部一一查明，严予法办；对于在作战中阵亡的人，则大加表彰，指示国防部要从优抚恤，并当场带着大家肃立，为之默哀。蒋介石特别列举古今中外的史例，论证“失败为成功之母”和“哀兵必胜”的客观规律和取胜之道。他着重讲“齐败于燕，国土尽失，据守孤城莒州、即墨二地，整军经武，明耻教战，卒能复国雪耻”之历史事例，并号召要“毋忘在莒”。他还讲到“汉高祖屡败屡战，终于取得全胜”，要求大家务必树立必胜的信心，卧薪尝胆，并提出“半年准备、一年反攻、两年扫荡、三年成功”的口号。

蒋介石讲话后，陈诚接着报告这次会议筹备的经过。他说这次会议是阎院长来台研究决定召开的，会议的议题是：（甲）大陆作战之检讨；（乙）东南地区的作战方略和政治经济措施；（丙）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组成；（丁）关于部队整编和训练。陈诚进一步就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任务，当前形势（大陆战斗态势和远东局势及美国的态度与外援的可能性），整编军队的要求，台湾建设（即所谓“基地建设”，由吴国桢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和六年经济计划），以及关于大陆作战检讨的目的和要求等等作了长篇讲话，他反复强调在进行大陆作战检讨时，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不要互相指责，只求分清是非，总结出经验教训就行了。

这次会上确定了部队整编方案，决定先行点验核实，然后根据要求整编，整编点验委员会由蒋鼎文负责（整编名义上由国防部领导，实际上受陈诚节制）。会上还研究了训练干部的问题，由万耀煌报告丁关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及其所属军官训练团的筹组情况、训练计划及召训对象等。何世礼报告了他访问日本时同麦克阿瑟会谈的情况，访问南朝鲜时同李承晚、李范夔等会谈的情况。19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到会讲话。20日会议结束，上午陈诚总结发言，下午顾祝同讲话，他说：“现在华中、西南、西北地区战事紧张，国防部将全力应付那方面的事情，东南半壁山河是我们的基地，特别是台湾澎湖地区则是党国中央的根基所在，是我们生存和反攻的基地，希望大家戮力同心，在陈长官的领导下，努力完成这次会议所确定的任务，上报总裁之重托，下答国人之殷望。”顾祝同当场宣读了行政院关于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和人事安排的决定，并宣布了国防部的相应命令，宣告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于即日正式成立。东南区军政会议到此遂告结束。

三、关于由台湾调兵增援福州的问题

《李文》说：“守福州及闽江以北部队，自7月间点验整编之后……朱绍良、李延年均甚隐忧。当他们洞悉第三野战军陈毅所部著名的第十兵团叶飞部已入闽后……朱绍良电请陈诚从台湾抽兵增防，以资固守福州，却迟迟未得复。迨7月下旬，陈诚始由台

湾高雄抽出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之第二十五师一个加强团 3000 人附山炮一连，由该师副师长阙某（四川人、名字忘记）率领来榕，弄得朱绍良啼笑皆非。”

《李文》又说：“当时台湾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也曾来视察一次，并向朱说明台湾兵力情况。他说，台湾在本年 5 月以前，只有第八十军唐守治部及第六军戴朴部……自上海战役后，撤回台湾的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第七十五军吴仲直部、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第九十九军邹鹏奇部和青年军第二〇四师蓝啸声部，俱是残缺不全，尚未补充完毕，须迨 8 月间始能外调。所以当前只能抽调第五十二军的一部，8 月上旬该军始能开拔前来，等语。”

就我所知，1949 年 7 月末，确曾由台湾派过一个加强团到福州增援，但《李文》上述各节，与事实略有出入，现补正如下。

是年 7 月，我正在台湾新竹第五十二军军部代理参谋长，参加过东南区军政会议后，曾与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一道到台北市杭州南路陈诚家中及长官部（介寿馆）陈诚办公室，同陈诚、罗卓英、肖毅肃、孙立人、阙汉骞、唐守治等研究过派兵增援福州的问题。

6 月在台北开东南区军政会议时，李延年和朱绍良、刘汝明在会上都夸大敌情，强调部队伤亡过大，兵力不足，任务艰巨，要求从台湾调兵前往增援。李延年要求向福州增派二个军，刘汝明也要求向龙岩、漳州地区增派一个军。孙立人当时对朱绍良、李延年、刘汝明那种任意夸大敌情，要别人派兵去替他们打仗的糊涂作法，甚为气愤，并曾据理予以反驳。孙说：“昨天研究部队整编方案时，我记得李司令官说过福州地区有 5 个军共 10 万余人；刘司令官也说他那里有 2 个较完整的军，共 6 万多人；良荣兄说他的第二十二兵团有 9 万多人。你们诸位都说部队还有战斗力，能打一下，怎么今天研究作战部署、分担战斗任务时，你们诸位又说兵力不足，战斗力很差，难抗强敌呢？请恕我直率，我们只有台湾这点老本了，既要保卫复兴基地，还要准备反攻。所以我建议：台湾的部队不宜外调，必须加紧整训，而福建地区的作战，应充分发挥现有兵力 25 万人的作用。”孙立人的一席话，虽然刺伤了朱绍良等人，但他们却因理屈词穷，只是气恼，而未便发作。陈诚内心里支持孙立人的意见，却又怕激怒了朱绍良、李延年和刘汝明，会把他们逼着去投共，只好对他们婉言相劝，叫他们不要急，并安慰说：“福建是台湾的屏障，我们既要确保台湾，自然要全力保守福建，现在加紧整编训练驻台部队，就是为了将来福建作战的需要；一旦有事，我不会坐视不管的。请你们放心罢。”就这样把向福建派兵增援的提议，给搁置起来了。

7 月 14 日蒋介石由台北飞往广州，会晤李宗仁，并主持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会议。行前，蒋介石鉴于解放军的叶飞兵团已大举入闽，正向福州外围步步进逼，为了迟滞解放军的行动，确保福州安全，曾电令朱绍良和李延年迅速收复古田等外围要地，以屏障福州。李延年为了组织对古田的军事行动，再次要求陈诚向福州增派一个军，以便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陈诚获报后，于 18 日派罗卓英率领参谋人员和海、空军联络参谋 10 余人飞赴福州，作实地考察。罗卓英认为古田必须夺回，但应集中优势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包围敌人而歼灭之，且打则必胜，借以鼓舞士气。他认为应当向福州增派一个军，以加强作战能力。这是罗卓英于 21 日在台北长官公署及随后在陈